

# 土地流转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探析

陆继霞

(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 100193)

**摘 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以资本下乡为特征的土地流转规模也在迅速扩张。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对黑龙江省 Z 县蕙村的调研发现,长久以来依赖土地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农户在其流转土地后,生计策略呈现多样性,包括外出务工、农业集约化、依赖地租、再小农化,等等。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生计策略所带来的结果是难以持续的,因而使得农户在土地流转的大潮中面临着更大的社会风险。

**关键词:**土地流转; 生计; 农户; 可持续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8)01-154-160

**DOI:**10.13713/j.cnki.cssci.2018.01.024

## 一、引言

随着我国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快速发展,与此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在广大农村地区的开展。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 2014 年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 4.03 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30.4%;截至 2016 年 6 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6 亿亩,超过承包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 50 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农户超过 350 万户,经营耕地面积超过 3.5 亿亩,而全国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已超过 270 万家。<sup>[1]</sup>对此,已有大量文献从多学科、多视角对土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及其对农村社区带来的各种影响和其他相关议题(如资本下乡、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等)进行了非常广泛且深入的调研、分析和讨论。

然而,对土地流转农户的生计状况的研究还

仍然有限。<sup>[2]</sup>笔者以“农地流转”或“土地流转”并含“生计”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时,共检索到 21 篇相关学位或期刊论文,其中包括硕士学位论文 6 篇、博士学位论文 1 篇、期刊论文 14 篇,这些论文发表的年份介于 2008 - 2017 年期间。综合而言,其主要采用的是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对土地流转与农户生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和分析,如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的影响,<sup>[3][4][5]</sup>以及农户生计的不同特征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等。<sup>[6]</sup>而从农户的角度出发,探察其在当前环境、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为何进行土地流转、土地流转后如何运用自己的各种资源、采取何种生计策略、又是何种生计结果的讨论尚还不够充分。

“可持续生计”框架,作为农政变迁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盛行以来,一直为广大学者和发展机构所熟知和推崇,并将其作为我们理解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是如何生活的”一个有效分析工具。本文希望运用该方法,对那些将土地作为重要生计来源的农户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土地流转后农户的可持续生计研究”(15BSH03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十三五时期’农村可持续发展研究”(2017RW002)。

**作者简介:**陆继霞,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与国际发展、发展干预与社区变迁,环境、健康与发展。

土地流转之后的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进行分析,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本文运用的材料源自 2017 年 6-7 月在黑龙江省 Z 县的实地调查。<sup>①</sup> 调研过程中,除了对 Z 县农业局局长 1 人、副局长 1 人以及 2 个合作社负责人进行访谈外,共访谈年龄在 25-85 岁之间的蕙村村民 59 人(包括村委会会计和普通村民),其中男性 28 人、女性 31 人。

## 二、案例介绍

蕙村地处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大县 Z 县。该县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松嫩平原的北端,大、小兴安岭的山脚,是著名的“边外七镇”之一。Z 县共辖 14 个乡镇、近 150 个行政村,农户 9 万户左右,由于地处国家粮食主产区且黑土地保护带上,Z 县的工业发展并不发达,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一直以农业为主。距离县城 12 公里、位于东南方向的蕙村共有 467 户,2676 人,同其他县域内的普通村庄一样,蕙村农户的生计途径相对有限,也是以农业为主。蕙村的耕地面积共有 15924 亩(约 1060 公顷),人均耕地 6 亩左右,近年来种植作物以大豆和玉米为主。

正如全国成千上万的北方农村社区一样,在蕙村,农户世代代具有农业种植的传统,1982 年,蕙村的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便以家庭经营为主,村里少数外出务工者的土地也是在亲戚朋友间进行自愿流转,价格由农户之间自己商定,蕙村的土地都是本村农户在种植。由此,在蕙村,从未出现任何弃荒撂荒的现象。几十年来,在整个 Z 县,蕙村都是出了名的“爱种地”、“种地好”的村庄,并且,也是 Z 县内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村庄之一。蕙村的农户除了在本村耕作自己的 1060 公顷的土地外,他们还在 Z 县内本乡镇的邻村、100 公里外的其他乡镇,以及 200 公里之外的内蒙古等地区承包农户或部队农场的土地进行耕种,用村民张诚的话说,“这个村子的人就是爱种地、也会种地。”为了能够增加收益、养家糊口,多数农户除了种植自己的耕地之外,在其他地方承包的土地面积在 40-100 公顷之间,他们认为,在贷款难、雇工难的情况下,就自家的资金能力和人力资源水平而言,这种规模

更加适合运用小型机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经营。

2012 年开始 Z 县开始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其核心是改革农业经营体系,以发展由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模式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型。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大批农民种植合作社、生产大户、家庭农场以及少数农业龙头企业在 Z 县开始出现。截至 2017 年 6 月 Z 县共有注册资金在 1000 万元以上的大型机械合作社 37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70 个、生产大户和家庭农场 700 多个。据统计,当前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经营的土地面积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60%左右。Z 县县域内除了那些土地不规整、不利于大型农业机械作业的偏远山区,其他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将土地流转给生产大户、家庭农场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手中。在此大环境下,2013 年,蕙村部分村干部牵头,为本村也注册成立了一个种植专业合作社,最初,全村的农户都带地入社,即合作社将全村所有的土地都承包过来,并进行连片管理和向外承包。此外,合作社还负责为全村的种植户提供深翻整地服务。2013-2015 年,蕙村的土地主要是集中在 3-6 户少数本村或村外来的生产大户手中,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由于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玉米种植期间,土地流转农户所获得的地租价格也较高,在 5000-6000 元之间。然而近两年,随着中央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政策的变化,Z 县玉米种植规模大幅下降,蕙村也受到了影响。一方面,经营的生产大户种植作物从玉米转为大豆后,农户流转土地的地租价格下降到 4500-4800 元之间;另一方面,农户流转土地的对象变得更加不稳定,每年都在发生变化,用村民王旬的话讲,“一年换一个老板,干一年,赔钱就跑了”。

可以说,蕙村过去这五年的土地经营者一直都处于变动状态。除了上述种植大户由于赔钱主动退回土地的情况,也存在农户在流转土地之后第二年主动将土地收回的案例。所以,对于村庄土地经营者的比例只能是截取某一个节点的数据。在笔者调研期间,蕙村全村的土地有近三分之一的面积是由农户自己耕种,而其他三分之二则是经由合作社将土地流转给其他村内、外的农

<sup>①</sup>感谢胡琴、庞欣、卢娇立、郑梦珍、唐若琪、李琳琳、张维宾几位同学参与本研究实地调研搜集资料的过程。按照学术惯例,文中村庄和村民的名称均为化名。

户或生产大户进行经营。<sup>①</sup> 这些流转的土地共划分为六大片, 分别由 3-6 户集资联合经营(以降低风险) 面积在 70 至 90 公顷之间不等, 此外, 村里有少数农户经营的土地面积在 20-40 公顷之间, 可以称其为中农。无论是农户之间还是农户与生产大户之间进行土地流转, 合作社一般不干预合同签订和租金支付环节, 都是农户与经营者之间直接商议价格、签订合同, 为了保险, 双方都认可每年签订一次合同、有效期为一年(从种植季到收获季, 一般为 3 月整地到 10 月收割)。关于地租价格、粮食直补等, 由土地流转双方直接进行协商。蕙村的“规矩”一般是由土地承包者获得粮食直补, 但如果土地经营者想获得粮食直补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流转土地的价格(地租)也会上涨, 按照村民的话讲, 都是一样的道理。但非常明确的是, 大豆差价补贴(每公顷 1960 元)是由土地的经营者的(种植农户)直接获得, 即“谁种谁得”。

在蕙村, 无论是生产大户还是中农或小农, 耕种的作物几乎都是大豆或玉米, 此外还有少部分杂豆(芸豆)。尤其是近两年, 由于国内玉米生产面积调整政策以及近两年大豆的价格走高等因素的影响, 蕙村绝大多数农户和生产大户都从玉米生产转为大豆生产。基于当地气候条件, 3-10 月为一个生产周期, 其中整地、播种、中耕、打药、除草等田间管理, 以及后期的收割时间共需要 30-40 天的人力和机械投入。无论是生产大户还是小农, 耕地都是用蕙村合作社的大型拖拉机进行深翻, 而喷药则是由经营者用自己的四轮机携带喷药机进行, 单程能够装载 250-400 公斤的水, 用 10-20 个喷头一次性喷洒 8-12 个垄。简言之, 无论是多大面积的大豆种植, 所采用的方式都是相类似的生产方式——机械化生产, 包括从喷药除草、整地、深耕翻地、播种到起垄、喷药除草及收获等全过程, 除非在大豆成长期田间杂草(主要为红根苋菜)比较严重, 通常土地的经营者的都不会使用人工劳动力或雇工。

### 三、土地流转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

#### (一) 关于生计分析方法

虽然生计分析方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有学者开始使用, 但作为概念第一次提出来当属

1992 年由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IDS)的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和戈登·康韦(Gordon Convey)两位学者发表的工作论文, 其中对“生计”的定义如下:

生计包括实现某种生存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以及活动。如果一种生计能够应对压力和打击并从中恢复, 且可以维持和加强其能力和资产而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 这种生计就是可持续的。<sup>[7]</sup>

此后, 有大量学者和发展机构运用该生计概念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生计状况进行分析, 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生计的涵义及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不断进行拓展。<sup>[8]</sup> 为了有助于在更广泛、更宏观的视角下理解农户在土地流转后的生计问题, 本文在上述生计概念的基础上, 尝试引用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曾提出的四个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问题: 谁拥有什么? 谁从事什么? 谁得到什么? 他们用所得物做什么?<sup>[9]</sup> 以及伊恩·斯库恩斯(Ian Scoones)后来增加的两个问题: 即社会关系和可持续性, 对当下农户在土地流转大潮中的生计状况(包括拥有什么样的生计资源、在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下, 产生了什么样的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进行考量, 从而避免迷失在微观特性或复合的决定因素中。

#### (二) 农户生计策略分析

如上所述, 蕙村的耕地三分之二以上的面积由农户经过合作社而流转到了本村或外村的生产大户手中。并且, 蕙村的农户向外进行土地流转的原因也同笔者在河南进行的经验研究的发现一样, 主要是因为缺少劳动力或社区压力, 等等。<sup>[10]</sup> 在生计策略方面, 笔者研究发现, 蕙村农户在土地流转后, 除了少数农户纯粹依靠地租生活以外, 其他大多数农户是在地租收益的基础上, 依靠外出务工或打零工、或农业雇工活动、或扩大农业生产面积等, 呈现出多样化的生计策略。

1. 外出务工或打零工。调研发现, 目前蕙村外出务工的 60 多户中, 有 20 多户是在农业活动之外主动走出村庄到城市中寻找就业机会, 而其他 70% 的农户外出务工则是由于过去几年里在农业生产中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赔钱后而作出的

<sup>①</sup>据被访者介绍, 村里每年都有新的承包土地的经营者的, 每年都在变化。本村的村民能否成功流转进来这些土地进行经营, 主要是看谁出的价格更高。

无奈选择。按照被访谈者孙某的话说,“原来蕙村富裕户很多,而且都是因为种地挣了钱。但最近几年因为干旱、涝灾或者冰冻等自然灾害,种地赔钱的人太多了,少则二十万,多了上百万,所以不得不把自己家的地也流转出去,到大城市去打工来赚钱还账。”

除了上面提到的远赴其他省市长期在外务工的家庭之外,蕙村还有一些农户(20户左右)将自家土地流转出去后,每天骑行摩托车往返于村庄和县城之间,主要从事装修、建筑以及服务等行业的工作。由于居住县城生活成本较高,这些农户属于“离土不离乡”的工作状态,尽管将土地流转出去,但仍然每天居住在村里。此外,有些农户(10户左右)是工作和居住都在县城里,之所以如此选择,主要是为了陪孩子在县城的中小学读书。

2. 农业雇工。在官方的统计指标中,雇工并不存在。然而,规模化的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农业雇工的产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尽管在蕙村,农业雇工的数量不多,但仍是部分农户在土地流转出去之后可选择的生计策略之一,而且,其特点是“不离土不离乡”的状态。本研究发现,蕙村从事农业雇工的村民数量在50-60人之间,且以年龄在40-60岁间的中年妇女为主,此外,还有少数(6-8人)是由于身体健康或年龄的原因被城镇劳动力市场所“抛弃”/排斥的男性村民。

蕙村的农业雇工从事的是符合当地气候条件的季节性工作,工作距离包括本村或是其他村落的农场。农业雇工的时间通常在6-8月期间,每天工作时长为8-10个小时,日工资为100元/日,每天干活结束后直接现金支付。如前所述,由于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土地规模化和机械化生产,规模较大的农场一般都是机械化作业,包括播种、深耕、喷药、收割等环节,由此,在机械化为主要的生产模式下,无论在本村还是在其他地区的大农场,农业雇工能够参与的种植环节主要是除草(即铲地)工作,而且只有在田间农药无法控制杂草的情况下,农场才会需要雇工。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在蕙村甚至是Z县的地域内,农业雇工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村里的经营者,无

论是生产大户还是小农,农业雇工的情况相对简单便捷,通常是“雇主”直接到田间地头观察或向村里的熟人打听哪些人做的活“更干净”,然后谈好干活的时间和地点,直接使用并当时就在田间地头付账结算。但蕙村村内对农业雇工有限的需求远远不能满足村里几十个雇工的生计,他们更期望村里的“雇工头儿”武明能够带着自己多到村外去寻找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听说哪里有用工需求,蕙村的雇工都会在凌晨2点甚至半夜12点左右就到武明的家中去排队,<sup>①</sup>最终谁能坐上那辆拥有有限座位(仅能装载20-25人)的拖拉机,谁才有机会被雇佣。此外,农业雇工就业机会的有限还受另外一个因素的影响,即各个农场除草的时间都很接近,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机会成本。据被访者介绍,通常一年下来,雇工能够耕作的时间只有30-40天之间,个别人甚至更少,收入非常有限。

3. 农业集约化。在蕙村,并非所有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户都在从事非农活动,其中一部分农户便是将自家在村中小块的土地(2-4公顷)流转给其他农户或生产大户后,自己和家人到100-200公里以外县域内或内蒙古地区的其他乡镇或部队农场去承包土地,从事农业集约化生产活动。在蕙村,这种类型的农户有15-20户,每户流转的土地面积多在40-70公顷之间,只有极少数农户流转耕种的土地面积在100公顷以上。如前所述,这些农户在蕙村外通过土地流转而耕种的土地面积共达2000公顷以上,是本村耕地面积的2倍。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蕙村大多数农户都是将农业集约化作为自己重要的生计途径,“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在耕种自家承包土地的同时,在其他地方承包土地来种”,以增加收益。然而,近5年来种植大户所面临的金融和自然风险却让一些农户望而却步,在外承包土地的农户由原来200多户减少到现在的20户左右。据被访者称,2016年7月中旬到8月底近50多天当地都没有下雨,结果1亩大豆才收获50多公斤,严重减产,一年下来,1公顷土地去掉人工费用、种植化肥、地租的费用后,每公顷土地亏损3000多元,农户张兴在2016年就亏损了8万元。而2017年春季

<sup>①</sup>武明在过去近10年里,成为本村农业雇工和其他地区农场之间的联系、组织者。通常蕙村的村民都是从他那里获得其他乡镇或省份需要雇工的消息,而参加他组织的雇工活动。

的一场风灾,使得蕙村西侧的 90 公顷土地全部受灾,尽管经营者在风灾之后采取了补苗等措施,但也不能确保收获预期的产量,而面临着严重的减产或绝收的可能。被访的农户多数表示,在当前的自然环境和农业政策背景下,种植面积在 40 公顷以下的中农的经营状况尤其堪忧,由于他们不能像生产大户那样获得贷款服务和一定的政府补贴,却又因为生产大户的存在而不得不面临地价抬高、耕地深翻费用上涨等生产成本的变化,最终,他们本以为通过扩展经营土地的面积而增加收益的希望往往由于一次自然或人为的<sup>①</sup>旱涝灾害的降临而血本无归。

4. 再小农化。经研究发现,由于农户与流转土地的生产大户之间签订的合同是每年签订,所以,当有些农户发现自己在流转土地之后,土地流入方并不能如自己所期待的那样“精心地照顾”自己的土地<sup>②</sup>或者自己在脱离土地后无法及时找到理想的替代性生计途径时,往往会在第二年种植季之前(每年的 12-3 月期间)提出收回自己的土地。换句话说,当村民发现自己的土地在流转后出现荒芜、疏于照顾而又没有其他更好的经营活动时,会将种植土地仍然看作是一项相对收入稳定的事情,而从事再小农化生产。调研发现,小农自己在经营土地时的收益,往往会高于流转后单纯土地租金的收入。大多数被访者称,生产同样的作物如大豆,每公顷土地流转的地租大约为 4500-5000 元,会比自己耕作时少收入 2000 元左右,所以,只要自家有充足的劳动力,都愿意自己经营土地。此外,这些农户将土地收回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由于土地在经营者手中种植多年而变得荒芜,从而给自己将来再对土地进行清理而增加了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成本,如在自家劳动力有限度情况下需要雇工才能及时将杂草清除,所以,尽早收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因土地荒芜而带来的损失。

这些再小农化的农户多是年龄在 30-58 岁之间的中年人家庭,他们由于照顾在家的老人或孩子等原因而无法外出务工,因而在县域范围内打一些零工,来实现兼业生计需求。对于这些

小农而言,他们并非不想扩大自己的农业生产,然而,在当前农业补贴政策环境下,他们称自己无法与那些资本量较大的生产大户进行抗衡,甚至原来一些在本村内通过自愿流转土地进行耕种的农户,当生产大户出现时,也放弃了原来的种植规模,而退回只种植自家土地的小农耕作模式,因为“土地流转的政策事实上抬高了地租的价格”,原来仅仅 2500 元/公顷的流转地租,目前已经涨至 4500-5000 元/公顷。

5. 依赖地租。在蕙村,将土地流转出去而又没有其他生计途径的农户数量大概占土地流转农户的四分之一,他们多是那些或年龄较大、或家人有重疾或严重的慢性病等严重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尽管这些农户在交谈中表现出将土地流转出去的不情愿,但对于无力耕种的现实却也无可奈何。此外,他们更担心的问题是土地在若干年后再回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不知道还能否种植,因为“眼看着地里越来越荒,<sup>③</sup>农药根本都打不住,‘他们’全都用机械种地,照管得远不如自己种地那么仔细”。

6. 其他。在蕙村,农户在土地流转后除了上述生计策略外,还有极个别的农户从事运输业和养殖业活动。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蕙村全村只有一户从事运输业,该户的被访者李利称,自己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从事体力劳动,打工和种地都不适合,因此,和亲戚朋友合资购买了 2 台大卡车,为当地运输货物所用,然而,收入状况也没有他当时想象的那么好,目前生活费用主要还是依靠以前父母承包土地的储蓄,在“吃老本”。谈及养殖业,在蕙村也只有 6 户在经营,其中 5 户养猪、1 户养牛。养殖业之所以不被村民看好,是由于目前养殖业的政策要求和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非常大,如要求养殖区不能在居民生活区、建筑面积和养殖数量都必须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等等,更重要的是,有的农户过去曾因养殖而赔钱,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农户对养殖业的生计选择。

### (三) 农户的生计结果

概括而言,蕙村的农户中除少数“离土又离

<sup>①</sup>这里的“人为”指的是村民介绍的一场水灾。2017 年强降雨季节,由于一个水库泄闸放水而导致蕙村的土地受淹,但农户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或补偿。

<sup>②</sup>被访者称,自己耕作土地时,会适时地打药控制荒草,而且会投入人工劳动力除草,这样效果更好。但是,大规模土地经营者通常是打药次数增加,但人工劳动力使用少,结果土地杂草逐年加重。

<sup>③</sup>荒:杂草较多,当地的一种地方说法。

乡”而外出务工之外,大多数农户在土地流转后仍然依赖的是与农业相关的生计途径。如果将这些从事农业生产或依赖地租的农户的生产投入-产出以及收益状况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如表 1 所示):相对而言,小农自己耕作土地时获得的收益最高,比单纯依赖地租每公顷多收入 2306 元左右,这也是那些没有劳动力而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农户之所以表示出无奈、以及有的农户将土地流转后又将土地收回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相比于那些中

农和生产大户的情况,由于小农无需支付地租以及因照顾更加精细而产量较高等原因,其收益也呈现出明显的优势。虽然,中农和生产大户均依靠耕种土地面积大而赚取收益,但事实上,不同面积规模的农户仍然在获得政府补贴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如只有那些面积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农民合作社(1000 公顷)才能获得深翻补贴,极少数更大规模的合作社(如 1 万公顷以上)还能获得“黑土地”等种植补贴,因此而获得更高收益。<sup>①</sup>

表 1 不同类型农户的收益情况(以 2016 年大豆生产为例)

	家庭耕种面积(公顷)	投入(元/公顷)	产出(元/公顷)	获得补贴(元/公顷)	收益(元/公顷)
土地流转农户	1-4	0	4700(地租)	1000(直补)	5700
小农	1-4	1200(豆种)+500(化肥)+330(1次农药)+350(翻地)+350(收割)=2730	24(袋)*90(公斤)*3.6(元/公斤)=7776	1000(直补)+1960(大豆差补)=2960	8006
中农	20-40	4700(地租)+1000(种子化肥)+800(2次农药)+350(翻地)+200(机器维修)=7050	20(袋)*90(公斤)*3.6(元/公斤)=6480	1960(大豆差补)=1960	1390
生产大户	>70	4700(地租)+1300(种子化肥)+800(2次农药)+350(翻地)+200(机器维修)=7350	21(袋)*90(公斤)*3.6(元/公斤)=6804	1960(大豆差补)+350(深翻补贴)=2310	1764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查中访谈资料整理而成,估算值(由于各种类型生产者均有雇工现象,暂忽略雇工费)。

此外,经研究发现,蕙村的农户无论在何种原因的驱动下,将土地流转后,都在努力运用自己的生计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组合而采取不同的生计策略,以应对各种风险、降低自己的脆弱性。针对上述运用

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如表 2 所示),他们所拥有的、所做的、所得到的以及对所得物的处理几个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但最终多数农户由于各种原因还是仅停留在满足自家的生产、生活消费和再生产上。

表 2 采取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生计结果

	谁拥有什么	谁做什么	谁得到什么	他们如何处理的?
外出务工的农户	自然资本(土地)、人力资本	建筑业、服务业等非农活动	地租、月工资	日常消费和家庭再生产,部分或偿还债务
作为农业雇工的农户	自然资本(土地)、人力资本	有限的以除草为主的农业活动	地租、日工资	日常消费和家庭再生产
农业集约化的农户	自然资本,其他农户土地的经营权,人力资本、金融资本	农业生产所有环节的管理、劳动	土地收益,部分农户有地租	日常消费和农业再生产
再小农化的农户	自然资本(土地)、人力资本	农业生产所有劳动环节的管理、劳动	土地收益	日常消费和家庭再生产
依赖地租的农户	地租	无	地租	日常消费和家庭再生产

被访谈的农户中,除了极少数生产大户(3 户)表示对当下的生产和生活现状表示满意并对未来满怀憧憬外,大多数农户都对现状表达出不满意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甚至有农户表示,无论是小农生产还是生产大户,最近几年蕙村村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境况远不如从前,甚至从 Z 县曾经最富裕的村变成了当地最穷的村

庄。由此看来,无论采取何种策略,蕙村农户都在面临着两难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将面临着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和自然灾害而带来的赔钱的风险;如果将土地一直进行流转,则会面临未来自家的土地质量下降,而影响地力和土地效用的问题,至于外出务工者的境遇已有大量文献的讨论,这里将不再赘述。

①注:多数受访者称,是否能够获得各种政策补贴,并非完全根据经营者经营土地的面积,而是受到多因素的影响。

#### 四、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非农活动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长期以来,土地一直是蕙村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重要的生计来源,也正因为如此,蕙村曾经在过去几十年里都作为当地较富裕的村庄而存在。然而近几年来,伴随着当地政府对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推动,蕙村大多数农户将其承包的土地通过村里的合作社进行了流转,并进而在现有自然和社会环境下通过自己有限的生计资本的组合而选择了不同的生计策略,并呈现出多元性,如:外出务工、农业集约化、再小农化、依赖地租等等,其中,完全脱离于土地的外出务工和依赖地租的农户在土地流转的所有农户中所占的比例仍然有限。目前,在土地流转的大潮中,农户无论采取何种生计策略都尚未能给自己吃下一颗定心丸,换句话说,从长期来看,蕙村的农户呈现的是不同时期在不同生计策略间的变化与调整。但土地,作为农户一直以来所依赖的重要的生计途径,在整体上并没有让位于其他就业。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农户选择了小农还是中农的生产规模,都无法从现有的农业政策中获得与那些以资本为特征的生产大户一样的支持,因而陷入了一种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而表面上那些看似主动选择了离开土地而到城市中从事各种非农活动的蕙村的外出务工者,也并非其家庭所谓理性的、优化的生计选择,其背后掩藏的是为外人所不知的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各种辛酸故事。此外,在土地流转后,尽管有较多农户有意从小农生产转向农业雇工的方向,但由于大规模的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客观上排斥了农业雇工的就业需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业雇工群体的扩张。本研究发现与黄宗智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即我国农业资本化的发展趋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业雇工的大规模增加<sup>[11]</sup>,因而导致,“不离土不离乡”的农业雇工的生计后果令人堪忧。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对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这一宏观议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其中有影响力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种观点是从恰亚诺夫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农业仍然以小农或小规模经营为主体,他们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另外一种观点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认为中

国小农在农业资本化的道路上正在丧失主体性,开始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化农业。<sup>[12]</sup>本文通过在蕙村的经验研究,或许可以为这两种观点的讨论添加一个注脚。简言之,从可持续生计分析的视角来看,目前在大规模土地流转的洪流中,农户虽力争运用自己的各种资源来维持自身的生计,但在现有环境下,其生计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并且这些农户的命运沉浮正在陷入一种不可知的状态而潜伏着一定的社会风险,他们所承担的是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社会风险所带来的社会代价,但目前学界对这种后果的评估尚不够充分,而有待继续深入。

#### 参考文献:

- [1] 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到 4.6 亿亩 比例已超过三分之一 [EB/OL]. 2016 年 11 月 18 日, 土流网. <http://www.tuliu.com/read-46231.html>
- [2] 陆继霞. 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评述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29-37.
- [3] 翟黎明, 夏显力, 吴爱娣. 政府不同介入场景下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 PSM-DID 的计量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7(2): 2-15.
- [4] 赵立娟, 康晓虹, 史俊宏.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转型影响的实证分析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8): 158-162.
- [5] 张会萍, 胡小云, 惠怀伟. 土地流转下北京老年人生计问题研究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3): 56-77.
- [6] 纪红蕾, 蔡银莺.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 516 户农民为例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2): 220-226.
- [7] Chambers, Robert and G. Conway. 1992.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Brighton: IDS.
- [8] 陆继霞, Anna Lora-Wainwright. 铅锌矿开发对矿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 [J]. 贵州社会科学 2014(8): 107-111.
- [9] (英) 亨利·伯恩斯坦. 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M]. 汪淳玉, 译, 叶敬忠, 译校.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3-35.
- [10] 陆继霞, 何倩. 生计视角下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南省某县龙村的实地调查 [J]. 农村经济 2016(2): 39-43.
- [11] 黄宗智, 高原, 彭玉生. 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 中国的农业发展 [J]. 开放时代 2012(3): 30.
- [12] 严海蓉. “中国农业的发展道路”专题导言 [J]. 开放时代 2015(5): 13-17.

[责任编辑: 秋 实]